

张凤林 著

西方资本理论研究

THEORY
OF
CAPITAL
HISTORY
ANALYSIS
AND
RECONSIDERATION

辽宁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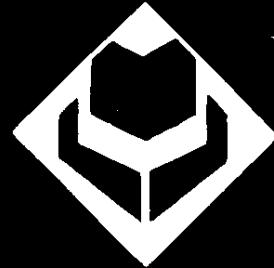
● 对西方资本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整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无论从涵盖的时间跨度还是理论深度看，在国内论著中都是少见的。●
辑严谨，层次清晰，分析和论述深入，评论得当，逻辑严密，语言流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
人以一气呵成之感，其有开创新和

西方 资本理论研究

张凤林 著

THEORY
OF
CAPITAL
HISTORY
ANALYSIS
AND
RECONSIDERATION

辽宁大学出版社



辽宁大学博士论丛

(辽) 新登字第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资本理论研究/张凤林著.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 10

ISBN 7-5610-3049-5

I. 西… II. 张… III. 资本—经济理论—西方国家
N. F0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8409 号

西方资本理论研究

张凤林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地方国营新民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30 千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责任编辑：李文禄
胡家诗

封面设计：刘桂湘
责任校对：张承中

ISBN 7-5610-3049-5

F·483 定价：26.50 元

《辽宁大学博士论丛》

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宋则行

副主任委员 顾奎相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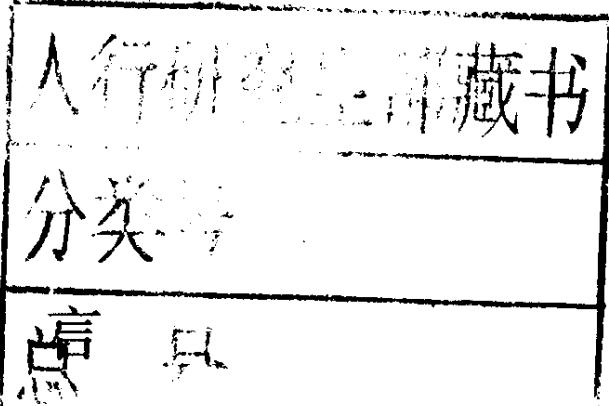
千文甲	王 征	王向峰	冯玉忠
刘祁涛	张今声	李文禄	金明善
郭国勋	杨玉生	董厚德	程 伟
彭好荣	赖翔飞	戴伯勋	戴天民

编委会助理 胡家诗



作者简介：

张凤林 1954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2年辽宁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以后，师从名家宋则行先生攻读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分别于1985年和1992年取得硕士与博士学位。现为辽宁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近年来，致力于西方经济理论及其对于中国改革史发展之借鉴意义的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动态》、《管理世界》等10余种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出版过主编、参编（或参译）的教科书及辞典4部。在关于两个剑桥论争、希克斯资本理论、新古典学派历史地位、金融市场构造与股份制、人力资本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曾经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这些成果，不论是关于纯经济理论的分析、评介，还是关于实用模型与技术的借鉴应用，都对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技术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很深入的程度。一方面，在究竟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西方经济思想的问题上，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左的观念仍然不时地以顽强的力量表现出来，对西方经济思想继续采取一种陈旧过时的教条态度，盲目地将其排除在人类共同的思想文化宝库之外。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们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研究水平的深入和提高。另一方面，就研究领域而言，也尚未全面展开，不仅对于近年来新出现的各种理论思潮与流派缺乏系统的分析，而且对于若干较早的理论发展也未能形成有高质量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关于西方资本理论的研究便属于这种情况。虽然西方资本理论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且其演变至今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理论部门，但是国内学术界却尚未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并展开深入系统的研讨，从而形成了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

本书试图来填补这一空白。本书以西方资本理论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西方资本理论进行一种历史的、客观的、中肯的考察论述和分析评价。这种研究目的与方法论决定了我们将把西方资本理论乃至

整个西方经济学摆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即把它们作为整个人类经济思想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理论财富的一部分来对待，以便挖掘整理其科学成分，为我所用。

西方资本理论是整个西方经济理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表面看来，资本理论似乎就是以资本或资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定义并不足以完整准确地把握西方资本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现状，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资本问题的看法和研究重心是各不相同的，从而资本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在其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是不尽一致的。在早期，资本理论曾经被作为一个独立单一的理论分支而与其他经济理论区分开来，然而在发展到现代特别是当代的阶段以后，它便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包括多方面的经济理论在内的高度综合性的理论领域。到目前为止，西方资本理论的研究一般地扩展到生产、收入分配、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动态均衡与非均衡、资源最优配置等等许多方面，因而它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规模庞大的一个理论研究领域或部门。

资本理论不仅是整个西方经济理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它的最困难的理论部分。首先，理论外延的广泛包罗性和复杂多样性导致了人们难以准确地从总体上来把握其发展情况。其次，理论分析的高度抽象水平和数理水平也增加了其理论内容的艰深性与晦涩性。最后，长期以来，特别是自上世纪末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围绕着资本问题的各个方面一直在展开着无休止的争论，这种争论发展到当代其理论论战的“火药味”愈加浓烈，由此自然也使得西方资本理论比起其他经济理论来具有更为复杂的特点。正是鉴于此，有的西方经济学家曾经说过：一旦人们在资本理论方面获得了明确的、一致的认识，那么在经济理论其他方面的一切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1], Pvii）。由此可以看出，西方资本理论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多么至关重要的地位。

研究西方资本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由于西方资本理论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的整体发展面貌，因此，系统地了解和掌握、深入地分析和研究西方资本理论，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开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西方资本理论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就，同时也包含着不少的缺陷，通过深入研究西方资本理论将使我们有可能在批判和摈弃其缺陷因素的基础上，积极地吸收和借鉴其理论的科学成就，来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服务，为组织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服务。如果读者能够通过本书而增进对于西方近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了解，并善于吸收其有价值的科学成分，进而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各种现实问题，那么，本书作者将会感到最大的欣慰。

本书属于对西方资本理论研究的一种尝试。书中力求在掌握比较翔实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及其当代最新发展情况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西方资本理论做出完整准确的介绍，系统深入的分析，和客观中肯的评价。然而由于所搜集的资料毕竟不全，更因作者水平有限，其中缺点、错误和疏漏之处一定不少，敬请学术界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第一章 导 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被称之为资本主义，原因就在于它大规模地使用资本并且在资本的社会经济关系下面进行生产。因而，资本乃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其他生产方式的显著特征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经济范畴。虽然像商品、货币、价值等等概念一样，资本的概念在人类社会早期的经济活动中就已萌发出来，然而真正系统科学的资本理论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像整个西方经济理论一样，西方资本理论也大致经历了古典的、现代的、当代的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并且现已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本章将对于西方资本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做一概略的鸟瞰式考察，同时对于资本理论在整个西方经济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做一简要的描述，以作为导论。

一、资本与资本概念的起源

资本是什么，它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作用与影响是什么？这个看起来似乎很为简单平常而实际上却极其复杂深奥的问题，在漫长的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一直是困扰着经济学家的一个重大课题。不同时代以及同一时代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都曾对资本进行过探讨，他们的认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最初，人们是在货币借贷关系中接触到资本问题的。例如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曾明确地将两种取财之道区分开来：其一是为满足使用价值或需要而进行交换，其二是为追求交换价值的积累而进行交换，即通过贷放货币而取得利息。他认为前者是自然和合理的，而后者则是不自然或违背伦理的。这里的后一种取财之道实际上反映的正是货币资本的运动。而资本一词（capital）的原义为本金（在希腊语中为κεφαλαιον）（[2]，P60；[3]，P53）也从词源学的角度证明了人们对资本最初认识的这种特点。亚里士多德反对放债取利的观点对欧洲中世纪影响很大，基督教福音书曾把利息视为最恶劣的牟利形式而严格禁止。然而世俗中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冲破了圣典中各种教条的束缚。从古代社会和中世纪人们关于利息合法与不合法的争论的各种论点中可以看出，那时人们是直接从货币形态上来把握资本问题的，即把利息或生息能力归结为货币或金钱本身。因此，人们所理解的资本运动乃是最简单的货币资本的运动，如果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符号来表示，即是：

$$G \longrightarrow G'.$$

到了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依稀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曙光。随着封建自然经济的日趋衰落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日益发展，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财富的空前渴望以及地理大发现对于世界贸易的极大刺激，导致了一场商业资本的革命。商人以及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资本的研究与考察便自然地集中于商业资本的形态，从而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者虽然仍旧承袭了早期社会关于货币与资本相等同的思想，将货币视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唯一形式。然而，重商主义者是从商人资本实践活动的观点或者说从商品资本流通过程的观点来考察货币资本的增殖的，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货币形态的资本与由货币所购买而最终为了出卖的商品资本区别开

来。例如，托马斯·孟 (Thomas · Mun) 在其《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4], P77) 一书中已经有了“存货”(stock) 的概念，他认为财富的一部分必须作为存货来加以利用，即用于为卖而买，以赚取利润。以后，巴本 (Barbon) ([5], P189, 328) 和达德利·诺思 (Dudley · North) ([4], P113) 几乎同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存货的概念，认为正是由于存货在贸易中的作用才产生了利息。这里的存货概念实际上指的就是商业资本流通中的商品资本存量。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不再拘泥于货币本身的增殖能力，而是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由货币所购买的东西所具有的增殖能力上，这显示了人们对于资本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对于重商主义时期人们所理解的资本运动，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G \longrightarrow W \longrightarrow G'.$$

在以后，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兼经济学家大卫·休谟 (David · Hume) 又对资本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用“存货”一词既指商品存量，又指货币总额，不过他明确地将单纯的货币投资与存量的生产使用即资本品区分开来，认为利息来源于前者，而利润则来源于后者 ([5], P328)。休谟的论述显示了将资本与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迹象，不过并不十分明朗。而真正的资本理论是必须经由系统的生产分析从而对于生产资本的考察才能建立起来的，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古典学派的肩上。古典学派生活于产业资本蓬勃发展的时代。商业资本孕育了产业资本。在商业资本所完成的原始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工场手工业，经过一系列技术革新特别是以蒸汽技术为动力的产业革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便演变成为以大机器为技术基础的现代工厂制度，这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以往的生产方式相比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大量地制造和使用资本品，实行最广泛的迂回生产，因而才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

和还要多的生产力。虽然人类自从脱离了蒙昧状态以后即已逐渐学会了制造工具，而不再单纯地从事“赤手空拳”的生产，然而，真正自觉地并且大规模地做到这一点却是在产业革命之后。因此可以说，只是在这时资本和资本关系才真正出现。这样的客观经济条件很自然地便决定了古典学派能够从生产过程来系统地考察资本问题，把资本视为一种生产手段或用于生产财富的存量。概括地说，古典学派所考察的资本运动可以归纳为：

$$G \longrightarrow W \cdots \cdots P \cdots \cdots W' \longrightarrow G'.$$

式中箭头的中断代表生产过程。这个公式比起上面两个资本运动公式来，所包含的资本概念显然要丰富和深刻得多，它实际上表明资本乃是一种通过生产过程而不断增殖的价值量，因而显示了产业资本已经成为主体的那个社会经济运动的本质特征。正因此，才使得古典学派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具有科学价值的资本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

现在我们来看看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在西方资本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像古典经济学本身标志着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开始建立一样，古典的资本理论也标志着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资本理论的开始，而在以前关于资本的各种思想则不过是某种史前的准备而已。

古典学派中最先创造性地进行资本研究的是重农学派。重农学派根本改变了以往人们关于财富起源的看法，把经济研究的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它主张农业生产是真正和唯一的生产领域，因而只有农业才是“纯产品”从而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重农学派集中考察了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本形式，即农业资本。例如，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F·Quesnay）曾对农业资本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他

认识到要进行大农业生产，必须首先投入各种物质资料，因而把资本称作“预付”。这种预付的最终目的是要生产纯产品，虽然他把纯产品武断地归因于自然，然而它在实际上还是隐约地体现了预付资本的某种职能，即体现为生产劳动的一种剩余。他又根据预付资本消耗和补偿方式的不同，将预付分为“年预付”与“原预付”两部分，前者为每年预付一次并且在当年补偿，后者为几年预付一次而在当年全部补偿，从而实际上在资本理论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这些反映了魁奈关于资本分析的新颖独创性。不仅如此，魁奈还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进行了天才的分析，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用五根线联接十来个出发点和复归点而绘制出一张著名的“经济表”（[6]，P192～216）。经济表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地对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进行了分析，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它对于后来的宏观经济分析和均衡经济分析产生了深远意义和影响。

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杜尔阁（A. R. J. Turgot），继魁奈之后对于资本理论进行了更系统和更具一般性的分析。杜尔阁的理论具有较少的封建外观和重农色彩，因而更加切合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情况。他虽然有时还使用“预付”一词，但更经常地是直接使用“资本”一词来代替预付。不仅如此，他已经不仅限于考察农业中的资本，而且还考察了制造业等等的预付资本。他分析了资本在不同行业的使用方式及其挣得的各种收入，从而相当完备地划分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基本收入范畴，诸如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等等。在杜尔阁的理论中，纯产品作为私有权的产物的特性显露出来，从而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朗化了。另一方面，杜尔阁同时又为资本生产要素的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5]，P328）。

在重农学派取得的理论成就基础上，亚当·斯密（Adam · Smith）对资本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斯密在其宏伟

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系统地考察了包括资本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方面，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而使自己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国富论》通篇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国民财富的起源及其增长的条件。斯密打破了重农主义者关于只有农业生产才创造财富的偏狭见解，明确断定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他认为，增加国民财富有两种途径，其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二是增加就业人数。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进行分工，而分工又与交换相联系，由此导致斯密分析了交换、货币、价值、分配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增加就业人数则需要资本积累，而这又被认为是增加国民财富的更重要的途径，由此斯密又展开了他关于资本理论的系统论述([6]，P361～413)。

斯密把资本定义为为了生产而积蓄起来的财富，亦即积累起来以便供生产工人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个定义与重农学派的“预付”概念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更加一般化了。斯密分析了资本的来源及其积累的动机，指出，资本来自于勤劳和节俭，通过勤劳创造了财富，而通过节俭又把它们积聚起来。所以，资本家的收入通常都分为两部分，一是用于目前消费的部分，另一是积累起来以用作资本的部分。而资本家进行积累的根本动机，则是为了获取利润。他写道：资本家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在此基础上，斯密进而考察了资本的构成与职能等问题。他明确地提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两个概念，并根据资本周转方式的不同而将总资本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两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把人们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技艺和才能也视为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这显示了他关于人力资本的先驱思想。他还区分了资本的各种形态，诸如工业资本、商业资

本以及借贷资本等等。关于资本的职能，他认为，资本的作用就在于推动和协助劳动，使生产得以进行。一般地说，流动资本通过预付而使劳动成为可能，固定资本则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使劳动更加便利，所以从后一方面看，资本积累也不单是导致劳动量的增加，而且还将提高劳动生产率。

斯密还注意到并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资本的出现对于国民收入分配从而社会阶级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他指出，在资本积累与土地私有权发生以前，产品价值唯一地由耗费的劳动量决定，从而全部收入都表现为工资而归劳动者所有。然而当资本积累与土地私有权出现并且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占支配地位以后，情况却不同了，这时资本所有者与土地所有者将不可避免地参与收入分配，因而产品在补偿工资以后还要出现剩余，即国民收入将要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三部分，从而劳动价值论部份地宣告失效。在斯密看来，资本乃是一种权力，它要求获取利润本是一种经济必然性，因此资本的出现便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此相适应，便形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三大阶级相互并存的结构关系。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斯密实际上理解到资本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他不仅从技术经济的角度而且也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考察资本，把利润视为因资本出现而发生的对于总产品的一种扣除，即一种剩余，从而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清楚地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第一个清晰地阐明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分配关系与阶级关系。这是斯密资本理论的重要功绩。此外，斯密还探讨了三个阶级三种收入的动态变化问题。他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地租与工资将会增加，而利润率将会逐渐降低。不过，他又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而对于资本积累始终持着乐观的态度。

总起来说，斯密的资本理论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

超过了重农学派，它标志着系统的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的确立。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大卫·李嘉图 (David · Ricardo)。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位伟大代表，他把斯密所创立的经济理论发展到最高峰，从而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继承了斯密的理论遗产，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基本概念、范畴甚至理论体系方面都是沿袭斯密的传统。从资本理论方面来说，他关于资本的定义、划分以及职能等等基本观点也与斯密大体上一致，并无多少新意。然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与斯密的相比又确实具有重要的特点。如果说《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国民财富的总量，那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研究的对象则是国民财富的分配。李嘉图在该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谈到：确立支配全部国民产品在三大社会阶级之间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6]，P452)。由此表明，李嘉图与斯密不同，他是把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学的主题，以此为核心来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由于李嘉图的这一理论体系对后来的西方资本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从广义上说它本来就应该属于其资本理论的一部分，因而我们在这里准备主要地概括说明一下这一理论体系。

李嘉图在正式考察分配问题之前，首先分析了价值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为了精确地阐明国民收入如何在各阶级之间分配，当然必须首先解决计量标准问题，而这个计量标准又必须对于分配来说是“中立”的，即不因分配的变化而变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李嘉图并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他最初是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原理，可是后来便发现了这一原理与平均利润率规律相矛盾，因为在固定资本耐久性不同以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比例不同的情况下，根据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实际上是生产价格）将因利润率从而分配的变化而变化。这便使他陷入困惑，并促使他试图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或一

种使价值尺度不因分配而变化的条件。李嘉图虽然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一难题，但是却为后人提供了重要启示，他关于分配因素对于相对价格影响这一思想成为后来的新剑桥资本理论的重要基础。

尽管没能解决不变价值尺度的问题，作为一种近似，李嘉图还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来研究分配问题。他像斯密一样，将国民收入划分为工资、利润、地租三个基本范畴，令其在工人、资本家、地主三大阶级之间进行分配。李嘉图认为，工资本质上是一个外生变量，它是由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亦即最低生活费用所决定的。他具体诉诸所谓“人口规律”来说明这一点，指出，在存在大量过剩人口从而劳动供给呈无限大弹性的条件下，通过劳动市场上的供求规律作用最终必然使工资固定在最低生活费用水平上。至于利润，李嘉图则明确指出，它是产品价值超过工资以上的余额，因而是一种剩余。他认识到工资与利润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并详细分析了这种对立关系的各种情况。最后，关于地租，李嘉图认为它是产品价值超过工资加利润以上的余额。他考察的是级差地租，并主要是根据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来说明地租量的决定，从而在古典理论中首次引进了边际分析方法。在他看来，地租是因农业生产力降低而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产物，而农产品价格上涨将会导致工资增长和利润的降低，因此在地租与利润之间也存在一种对立关系。明确阐述三大收入范畴之间的对立关系，这是李嘉图分配理论的重要功绩。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李嘉图又引进资本积累因素，考察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动态及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按照他的基本观点，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和经济的发展，将会导致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而由于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在农业中连续地投入同量劳动和资本所带来的产品增量将逐渐降低，从而农产品价格将逐渐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一方面会使